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4月號本刊發表了著名法學家伯爾曼的訪談錄，他提出新的世界法正在形成。此後不久，中國駐南使館被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飛彈摧毀，引發北京等多個城市民眾抗議美國霸權及侵犯中國主權的示威。「主權與人權」是政治學、法學和國際關係學必需面對的現實和理論問題。今年稍後，本刊擬請不同學科的學者就此專題發表意見；而今期本欄，已有這方面犀利短小的議論。

——編者

西方法律在新世紀的機遇

剛剛讀完伯爾曼的大書《法律與革命》，就看到4月號貴刊(第52期)對他的訪問，十分興奮。很想知道這位當代法的社會理論大師是如何循着十幾年前的言路，來論說新的語境下西方法律的問題。在伯爾曼看來，西方法律傳統的危機源於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的興起，以及福利國家和公司國家的湧現，那麼隨着冷戰的結束，這種危機得到緩解，還是繼續加強？在答問中，伯爾曼顯然更願意強調「危機」的另一重含意——「機遇」，此機遇建立在日益密切的跨國經濟活動和全球社會交往上，並可能形

成新的世界社群和世界法律。我不能不說伯爾曼太樂觀了。且不論全球一體化是否可能，也不說法律表達和法律實踐實際存在的距離，單就伯爾曼的「世界法」構想而言，跨國經濟活動的不平等關係和全球社會交往的強弱碰撞，必然使共通的規則面臨着「在地化」的難題，進而追問「何種規則？誰的法律？」科索沃危機證明，人權並不能成為伯爾曼所說的政治權威的法律之上的依據。面對全球的弱勢社群，必須尋找新的「世界法」的基礎。這種法律應該像伯爾曼在《法律與革命》中描述的，人們可以運用它來挑戰流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在克服西方法律危機，也即西方文化危機的努力中，「革命」的作用仍不可小視。這恐怕是伯爾曼的著作和答問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羅崗 上海

99.5.13

建立常識理性之難

《二十一世紀》4月號金觀濤、劉青峰的〈新文化運動與常識理性的變遷〉，以「常識理性」看五四，太好了。五四之弊，是低估「常識之難」，跟傳統派一樣，以為從某處(西方)

拿「常識」回來號令天下，便成五四諸先賢。幾無一人較為全面、深刻估計到「中國(傳統)常識」與「世界(現代)常識」之間的千年距離有多大、多深。傳統以「常識教人」，五四也要以「(新)常識教人」。到文革，一脈相承，未立新常識便以新常識教人。

八十年前，「只見有無數寄生之物，不見有獨立之人格」；八十年後，又如何？還不一樣？！中國官員、百姓、學術人士，每天一早仍在「辨風向、辨調子」。即使香港這片自由之地，九七前「政府不干預」是顯學，言無不「不干預」；九七後「政府趕絕」是顯學，香港學者有自由、有物質、有資訊，但仍依附權勢。

從中國的經驗，可見建立「常識」之難。香港建立常識近乎無痛，但一個現代常識的體制交給中國人自己管，卻見中國人(香港人)操作「常識」體制之難。中國能完成這轉型嗎？能過這關嗎？

洪清田 香港

99.5

政治改革與道義外交

1989年5月，北京以及各地的大學生以及市民舉行了規模浩大的遊行，要求懲治貪官污吏和進行政治改革，主張以制度化的方式實現自由、民主和人權。當時社會上充滿了對美國式的社會正義的嚮往。十年之後，在1999年5月，人們看到的是學生遊行隊伍包圍

美國駐華使領館，義憤填膺地抗議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

反差如此之大，諷刺如此之深，不能簡單以中國政府操作或者民意無常來說明。我認為，造成這種歷史大轉換的原因在於人權、主權以及霸權的三元互克關係。在現代化過程中，國家通過排除地方或身份的共同體等中間性權力關係而獲得了絕對的主權。而從共同體中解放出來的個人，卻不得不直接面對強大的國家主權，很難逃脫國家權力被濫用的威脅。在這種情形下，為了限制主權的濫用，當然需要法治主義和人權。的確，限制國家權力需要人權。但是，靠甚麼來限制絕對霸權？僅靠人權就足以保障霸權不被濫用嗎？非也。世界法治秩序的建立只能建立在主權平等和國際民主的基礎上，因此，為了限制世界霸權的濫用需要保障主權。但是，在國內不斷侵犯人權的主

權國家，也有可能以抵制霸權為藉口來為自己的錯誤進行辯護。這就是我們在紀念「六四事件」十周年之際所面臨的極其複雜的局面。

為了解開這個連環套而使中國進行正確的公共選擇，這裏我只想強調兩點：第一，在國內進行政治改革，加強對人權的制度性保障是一回事，而在國際社會反對霸權，維護主權的尊嚴是另一回事，這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應該也有可能分開來討論。第二，人權外交既有「兩重標準」、擁有霸權的國家借以干涉他國內政等問題，但畢竟是道義外交。對付道義外交的辦法只有兩種：(1) 國家權力必須保持自己的道義性，在人權保障方面不給霸權留下干涉內政的把柄；(2) 也開展道義外交，指出霸權的非道義性，並建立自己在道義程度上的優勢。當然，也需要輔之以實力外交。但是，情緒化的民族主義則只會犧牲民族的長遠利益。

季衛東 神戶

99.5.13

重建具有合法性的國際秩序

最近被「誤擊」事件搞得心神不寧。「誤擊」事件使我感觸最深的是，生活在不同文明社群中的人們相互之間對話的困難，理性交往的困難。國際政治歷來基本是在「無政府」狀態與「霸權」狀態的交替中展開。傳統的國際政治理論主張，只有在「霸權」狀態下世界才是相對有序的、安全的。但二戰後反殖民運動以來，舊有的國際秩序的正義性遇到挑戰。特別是在當今「全球化」的新局勢下，過去虛擬性的「國際社會」已經變得越來越「實質化」。因此，如何重建具有合法性的國際秩序無疑是二十一世紀最為緊迫的問題。其中的關鍵是如何將自由民主原則運用於國際社會，而這個建構過程無疑要通過跨文明、跨國界的複雜的鬥爭和對話才能推進。

劉擎 溫哥華

99.5.16

圖片來源

封面、封二 電腦製圖：林立偉；文字：金觀濤。

頁18、58、125、147 資料室圖片。

頁30、31 王苗作品。

頁73 *Nature* 391, 148 (8 January 1998).

頁74 *Scientific American*, 35 (May 1999).

頁81上 吳瑪俐：《碑》(1997)。

頁81下 邱志傑：《書寫蘭亭序一千遍》(1997)。

頁82上左 張洹：《12平方米》(1994)。

頁82上右 馬六明：《芬·馬六明(化裝)》(1993)。

頁82下 張洹：《為無名山增高一米》(1995)。

頁83上 任戩：《元化》(十二之六，1986-87)。

頁83下 文晶瑩：《美麗的花》(1996)。

頁84上左 林書民：《征服者》(1993)。

頁84上右 南方藝術家沙龍(王度、李正天、林一等)：《第一次實驗展之一》(1986)。

頁84下 蘇新平：《世紀之塔》(1996)。

頁85 Yin Xin, *Little Boy* (1997).

頁115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封面。

頁129 石元康：《從中國文化到現代性：典範轉移？》(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封面。

頁132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封面。

頁135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封面。

頁137 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北京：三聯書店，1997)，封面。

頁140 Robert D. Kaplan, *An Empire Wilderness: Travels into America's Futu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cover.

封三上左 曹涌：《關於第四紀前景的緊急播音》(1997)。

封三上右 王天德：《水墨菜單》(局部，1996)。

封三下 方力鈞：《第三組之十五》(1993)。

封底 毛旭輝：《剪刀和沙發之一》(1995)。